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解读^{*}

——科学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几个方法论问题

胡承槐

【摘 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理论,更不是关于私人赚钱的工具指导学。与其他任何经济学理论相比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理论特色就在于它的“政治性”:抱着为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辩护,为无产阶级求解放指引方向的价值观,用马克思创立的总体方法论结合历史、社会、法律、政治全景式地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资本的秘密和社会本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和历史宿命,并据此提出指导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原则和策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大体上是由价值学说、生产劳动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所组成的有机体系,需要我们同时运用“三只眼”,即“劳动价值论之眼”“劳动方式进化之眼”和“缩短工作日之眼”,去观照、领悟和理解它的博大与精深,并将它运用于改造现实世界,运用于劳动者解放的事业。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其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也可命名为“社会经济学”“历史经济学”。

【关键词】政治解读 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 社会关系 历史因素

【作 者】胡承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二级)。

^{*} 本文系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4MKSZ03ZD)和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流学科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面对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与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回避复杂性的困难、抓住经济过程或现象的一种规定性而忘记另外的规定性(这一点,在学术分工日益精细化的20、21世纪的经济学界表现得更为严重)^①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部“艺术的整体”(马克思语)或者说是关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总体性学说^②,它不仅将经济过程本身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总体,而且将经济过程置于整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中来加以理解。正是这一总体性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具有无与伦比的理论系统性、完整性、历史深邃性,而且具有持续的现实批判的实践深刻性和开放性、延展性,以及任何其他学说无法比拟、无法取代的思想史、历史地位。

一、几个前置的价值和逻辑前提

与任何经济现象都有现实的社会历史前提,任何经济思想都有特定的意识观念背景一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有它前置的价值和逻辑前提,且这些作为前提存在的思想、观点规定着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展开。

1. 与“国民经济学”将资本私有制作为先定的永恒的自然现象并从此出发解释经济运动过程不同,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这一逻辑前提不是先定的、永恒的,而是特定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历史后果,进而是可分析的、批判的,而且只有在对这一“国民经济学”的逻辑前提进行分析批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才可能是科学的、合乎事实本质的。^③

2. 与标榜“价值中立”,排除“公正”问题的干扰,“不偏不倚”地追求解决“效率”问题的那些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诚实地昭示自己学说的无产阶级立场,表明自己根本的理论任务就在于揭示资本是如何历史地生成,并在与劳动相对立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增殖的。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并不在于它能否排除“公正”问题的干扰,而在于它首先是否能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再现实出来,然后再进行价值评价、价值选择。诚如丹尼尔·W. 布罗姆利在讨论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② 胡承槐:《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方法论及其现实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103页。

策选择时所指出的那样：“不存在单一有效率的政策选择……关键的问题不是效率，而是对谁有效率？”^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按照理论的科学性要求与价值取向相互缠绕的客观规律性，一方面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资本生成和资本增殖的秘密进而揭露“国民经济学”的虚伪性；另一方面告诉工人阶级现实的真相，并教导和引导工人阶级如何争取实现自己的人权。故而，恩格斯深刻地指出：“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②在此，对于那些将经济学理论进而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当作“生意经”来对待的俗人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无用的，甚至是令人讨厌的。当然，如果有资产阶级的“高人”，在马克思那里从“反面”读出启示，并进而推出一些有利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稳定和存续下去的措施，那是可能的。不过，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对当下的无产阶级来说，并无坏处，比如通过立法保障和增进工人权益，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改善劳动环境，等等，那也是无产阶级通向最终解放的必要环节。^③

3. 资本与劳动矛盾关系的逻辑简化、资本主义社会属性的逻辑归结。与《共产党宣言》中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化为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统一相类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将“资本这一社会关系”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照之光，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理解为最基本的经济运动过程，全部经济关系的基础和内核，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全部经济现象或理解为资本与劳动这一矛盾体的展开形式，或理解为受资本与劳动矛盾关系支配的变体。把握这一点，可说是科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丰富性、开放性、完整性的关键。比如，有些人将“管理”当作一个在资本与劳动之外的独立要素，界定为在劳动之外的创造价值的独立来源，进而认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存在概念不周延的逻辑缺陷，就是不理解这一点的表现。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缺陷。因为，在马克思那里，管理要么作为资本的职能要素而存在，比如监督工人遵守工时，不得偷懒，等等；要

① 丹尼尔·W.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83页；胡承槐：《党内民主的政治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

么作为劳动的职能要素而存在,比如劳动分工、劳动协作、劳动交换的配置和协调;要么两者兼而有之。^① 故而,那种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忽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性、开放性、完整性,另一方面又借此宣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不科学”的局限性,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这在学术上不能不说是很不严谨的。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归结到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体运动的高度,而且将资本归结为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物来理解。诚如黄金就是黄金,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成为货币一样,土地、厂房、机器、货币,只有在它们成为雇佣劳动生产方式的基本要素且参与整个社会商品化生产循环的历史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一切生产资料和货币,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物和一般等价物的符号形式,本身并不直接就是资本和资本的存在形式,但当它们成为支配劳动并迫使劳动为自己的所有者带来剩余价值的时候,它就转化为资本的外在存在形式。进而,资本在本质上只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运动形式,它在物质形态上表现为投入一定的商品和货币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货币,在社会形态上表现为资本的所有者对劳动的支配和剩余价值的汲取,在历史形态上表现为过去的劳动支配现在的劳动、死劳动支配活劳动。

4. 特定的历史前提和历史因素的逻辑设定和揭示。与将社会经济关系合逻辑地简化归结为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相对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两个重要的特定历史条件的逻辑设定。一是商品经济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形式,交换价值及其外在形式货币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力量,商品—货币拜物教成为社会最核心的意识形态,货币成为真正的“上帝”。当然,这一历史条件的逻辑设定,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经过数百年的历史运动才生成的:最初孕育于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然后发育于地理大发现之后 16—18 世纪世界市场的形成、工场手工业及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最后进一步膨胀于 19 世纪美国加州、澳大利亚和南非的三次淘金热。^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逻辑设定,一方面说明了商品—货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另一方

① 胡承槐:《略论生产劳动合作关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1 年第 1 期。

② 吕福海:《美英为何有实力采取金本位? 19 世纪 3 次淘金热》,《人文历史》2016 年 2 月(下)。

面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态——生产目的的扭曲,和伴随始终的内在矛盾——如何保证全部社会产品实现向商品转化的“惊险一跳”。另一个历史前提的逻辑设定则是封建关系(广义地来说可扩大为一切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独立个人的生成以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通过这一逻辑设定、逻辑揭示,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却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预设了历史暂时性,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示了历史依据和逻辑依据——将独立个人的人权诉求推进到底:不仅在法律、政治、社会出身层面获得解放(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成果),而且在经济层面上摆脱雇佣劳动的束缚。

5.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价值和逻辑前提的预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超越了以理性、自然人性为逻辑前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同时代的庸俗的国民经济的狭隘性,克服了它们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价值偏见。在这里,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的含义是指为资本辩护、为国家敛财辩护,那么,“政治”一词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则被赋予了完全不同和视野更为广阔的含义:社会历史总体性。首先,这里的政治是“历史的”含义,政治经济学也可用“历史经济学”来替换。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时,原先笼罩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神圣光环立马就被驱散并显示出它的原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交换价值(货币)的“上帝”地位既不自然,也不永恒,更非神圣,不仅它的一切都是有历史前提的,而且这一切本身也都是暂时的,是要被内含在自身之中的矛盾性(规律性)所否定的。其次,“政治”一词也指“社会的”。用“社会”限定经济,从“社会”视角审视经济运动过程,其一是指经济现象、经济过程要以外部社会条件为前提、为基础,要受外部社会条件的制约,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封建关系的解体和独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为前提。其二是指经济现象、经济过程不仅仅是物的生产过程、交换过程,更是指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以物的生产过程、交换过程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及其再生产。比如,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生产出物质产品的背后是雇佣劳动关系及这种支配关系的再生产,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及这两大阶级内部对立、斗争和合作关系的再生产;再比如,联系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单纯的经济视角就显得狭隘,还必须要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这样才能看得更清楚。因此,政治经济学亦可与“社会经济学”互通。其三,“政治”一词

在政治本义上的使用,用政治一词限定和审视经济过程,意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同时包括政治关系,比如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及其他阶级围绕着各个权利和经济利益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和妥协,比如国家、法律(司法)对经济活动和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干预,等等。

概而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纯粹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它是物质的生产、交换过程的同时,又是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现象和过程。进而,经济学必然也是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学。经济学在考察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时,必须从经济的视角,同时又从历史的、社会的视角进行总体性的考察。

二、理论体系展开的三条逻辑脉络及其 实现交汇的三大分析工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大体上由三个相对独立又相互交结在一起的方面构成,沿着三条逻辑路径逐步展开并最终融合在一起。其第一条逻辑路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第二条逻辑路径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及其劳动工具、劳动关系历史性进步,第三条逻辑路径是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及其社会后果。在这三个方面理论内容的展开过程中,有三大基础性的核心概念“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关系”“历史因素”起着分析工具的作用,并最终将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编织成一个体系。

(一)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运动形态(过程)及其本质与内在矛盾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直观层面上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仅是物质生产过程,而且是价值(交换价值)生产过程,对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里,马克思将价值生产理解为动态的社会运动过程,并对这一过程从抽象到具体进行了全景式逻辑再现。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特殊形态、高级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深藏于商品生产的一般矛盾形式之中。贱买贵卖是商品交换活动的一般特质,但从全社会的视角来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全社会买卖双方的总价值必然是相等的,单纯的商品交换过程在逻辑上并不可能导致商品增值,

故而商品增值的秘密只能隐藏于生产领域:当货币持有者从从事单纯的商品买卖转变为商品生产者时,他就从货币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转变为产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的买卖活动相比较,产业资本家在买卖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即他在购买了物质商品的同时还购买了特殊的能动的劳动力商品。劳动力商品有物质商品的一般特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同时,还有其自身的重要特性:在劳动力的消费过程中,其具体劳动形成物质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交换价值,即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商品(生产资料)在商品生产的价值形成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交换价值),而劳动力商品在商品生产的价值生产过程中不仅补偿了自身的交换价值,而且还新增了价值,即剩余价值。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不过是这种剩余价值生产或说资本雇佣劳动(工人劳动力)方式展现的社会扩展形式。当我们的眼光随着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分析转向现实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表现现象时,马克思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具体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生产价格转化为利润、平均利润,平均利润如何分割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地租和利息,以及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等等。

其次,马克思在分析上述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运动过程中,深刻地揭示了交换价值(价值)、货币和资本在其连续运动过程中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本质。(1)人类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分离及抽象劳动的独立化、符号化。(2)抽象劳动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货币、资本)颠倒过来对人自身的支配。(3)这种支配关系造成它的人格化形态(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关系。(4)社会生产表现为通过表面上对以物质财富为载体的价值财富的追逐和占有,进而实现本质上是对人自身(社会)及他人的支配力量、支配权力的追逐和占有。(5)资本及其再生产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力量的再生产,本质上是以物质财富的再生产为外在形式,价值财富为内容的社会力量(及其结构)、社会支配(及其反支配)关系的再生产。(6)进而,在这里,在自由平等的外表下,我们所见的资本奴役制,虽然要比直接的奴役制好,并体现了历史的巨大进步,但它终究依然是一种奴役制。

最后,马克思在分析上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價值运动过程中深刻地揭露了其内在的深刻矛盾。(1)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关系中的买与卖这两个活动在时间上的分离,一方面拉长了社会活动的链条,拓展了社会活动的空间,为

扩大社会物质生产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劳动产品的最终实现,即在市场上转化为现实的商品制造了惊险的鸿沟,这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埋下了整个商品经济体系和交换链条断裂的隐患。随着从买与卖两个活动分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由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三大相对独立运行的分支^①所联结起来的商品(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发育,内在地包含着各类资本围绕剩余价值所展开的博弈、争夺必然越来越激烈,因博弈、争斗所可能导致的相互间均衡体系的破裂、社会经济运行动荡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

(2)生产活动本身与经济运行目的分离,经济手段的异化与反噬。与传统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经济、由小商品生产作补充的小农经济及简单的商品交换(物物交换)活动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主体的直接目的不是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获得交换价值。在这里,过去作为生产目的的使用价值、物质财富本身现在已下降为手段,进而,原来只是因为交换的需求和历史生成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却成为经济活动所追求的目的,同时也成了支配他人的手段,货币仿佛被赋予了活的灵魂,成为能动的主体,成为支配一切的主宰,而人却成了它的奴隶。

(3)由上述两大内在矛盾催生了第三大内在矛盾——阶级矛盾。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经济现象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人的关系,商品交换、资本运行不管它获得了多大的独立性表象,终归要反映到它的人格化存在,即人的活动方式和相互关系上面。进而,当我们从物(包括社会物质)的方面,实体的方面转移到从人自身的方面、主体的方面来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运动过程时,前述两大矛盾直接表现为人与人的矛盾,表现为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第一,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资本家作为资本力量的人格化象征而存在,工人作为劳动方(劳动力)的人格化象征而存在。资本家执行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增殖自身的意志,展开浑身解数获取剩余价值,而工人则一方面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象征而被非人化,另一方面作为人的本质(劳动)力量的现实载体反抗自身的非人化,要求从奴役制的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一斗争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始终,贯穿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第二,两

^① 土地要素可理解为第一个从外部嵌入的社会历史要素,当我们将眼光进一步放大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整个社会的相互关系时,还会发现有更多的其他因素嵌入到经济运行中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页。

大阶级内部的个人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博弈。第三,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社会力量因嵌入经济领域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而展开与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之间的合作、博弈、斗争。第四,经济力量伸延到社会其他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各阶层之间的合作和斗争以及思想意识形态代言人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二)劳动方式、劳动合作关系的展开形式和运动形态

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共有形式。判定经济时代、经济形态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生产了多少,而在于怎样生产,用怎样的劳动资料来生产,用怎样的社会方式来生产。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和充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发展,劳动方式、劳动合作关系的展开形式与运动形态,在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劳动方式合理化、科学化的历史功绩的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理性及其历史边界。

1. 雇佣劳动方式的历史生成和最初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一般商品交换关系中嵌入劳动产品生产过程或说将劳动产品生产过程移入社会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生产方式。最初,这里的劳动方式的自然形态方面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怎样的,就得开展怎样的劳动方式。从历史现实上看,在生产工艺层面上的意义,它与手工业行会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形态是相同的,至少是近似的,但是在社会形态层面上的意义已发生根本的质变:商品生产者和产品劳动者身份上的分离;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及其产品属于资本家。

2. 雇佣劳动方式下劳动的社会展开形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价值运动时曾指出,工人支出体力脑力,进而创造价值,对资本来说这是“自然的恩惠”。马克思关于在雇佣劳动方式下对劳动的社会展开形式的分析,则揭示了资本进一步获取“社会的恩惠”“历史的恩惠”的过程。首先,资本在历史上的第一个生产方式,即工场手工业阶段,是在与手工业行会相同的技术条件下展开自己的生产活动的,与行会师傅的作坊相比较只是扩大了规模、雇用了更多的工人而已。但是这一量上的变化,一方面因劳动者相互间的社会接触引起竞争心和精神振奋,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还因人数的增加而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力——简单协作的集体力;另一方面,因许多工人集中在手工业工场中

劳动,既节约了生产资料(如同一个厂房可容纳更多的工人),又使得劳动对象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同样的空间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其次,继简单协作之后发展起来的分工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方式的典型形态。它或者将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集中在同一个工场里,工人们通过相互间的劳动合作完成总产品,而每一个独立工种的工人则仅专注于其中的一项工艺,由此提高生产效率;或者让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种的手工业者集中在同一个工场里进行合作劳动,并从最初的简单协作劳动逐步合理化为分工协作劳动。比较工场手工业与传统手工业行会的劳动方式,我们可发现:一方面,劳动的个体形态变得简单了,工人成了局部劳动者;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形式却变得复杂了,原本由同一个人或数个手工业者在同一个时空场域里完成的动作,现在被分解成数十个甚至数百个工序,需在更长时间和更广空间里来完成。这种将单个工人劳动的简单化、总体工人劳动复杂化的分工协作劳动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它在给工人带来技能片面化、单一化进而与资本进行对话的话语权逐步下降的同时,却给资本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恩惠”:劳动的社会形态复杂化(或说复杂的社会劳动)所产生的更大的剩余价值以及与劳动对话时话语权的上升。

再次,不论是在同一个手工业工场里还是不同手工业工场间的分工协作,它都产生和奉行两个原则:单个劳动动作的简单化和节约生产商品所需要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而这两个原则又为劳动工具的进步即机器的采用提供了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机器,起初是单个的机器(工具机),后来又发展为机器体系。机器体系的根本特点是它能摆脱工人身体器官的限制成为独立的机构、独立的体系而使用很多数量的工具,它自身具备动力装置、传动装置和工作装置(作用于劳动对象)。当机器发展到机器体系时,资本主义生产也相应地随之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发展到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

与工场手工业生产相比,大工业机器生产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开辟了生产劳动与科学、教育部门之间的广泛联系,从而意味着资本的力量、资本的空间向科学、教育部门扩展和科学教育的力量向经济领域扩展;二是机械力大量代替人力、摆脱人体器官的限制,从而为生产力的无限扩张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无限扩大的可能性,在节约人工的同时又为宏观上需要无限用工打开了大

门;三是工人的劳动和技能进一步简单化、片面化,在机器面前的无力感进一步加深,反之,机器的自主性、能动性得到空前提高,现在不再是机器适应工人而是要求工人去适应机器体系;四是原来体现在工人劳动技能上面的时空划分与交换,即分工协作关系的主要部分,被转换到机器体系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交换上,表现为不同商品生产者主体的分工协作和交换。综合以上四个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在工人的劳动日益趋向简单劳动的同时,社会劳动则趋向更加复杂化。资本获得不仅扩大了它的“社会恩惠”的份额,而且新增了“历史的恩惠”:机器使用的进步是在科学(包括教育)应用的协助下获得的,而科学的进步则是历史积淀、文化进步的结果。从获取“自然的恩惠”到“社会的恩惠”再到“历史的恩惠”的发展过程,表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越来越隐蔽。通常人们对资本剥削劳动的直接形式即获取“自然的恩惠”是容易理解的,只需有最基本的感性直观能力即可,而对资本剥削劳动的间接形式、隐蔽形式即获取“社会的恩惠”“历史的恩惠”的理解,不仅需要直观的能力,而且需要综合抽象能力。

最后,依据机器大工业自身自动化发展和工业与科学之间联姻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两个伟大的预见: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从它的工业生产阶段逐步进入科学阶段,即科学的生产化和生产的科学化阶段;二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将越来越被机器所代替,而一旦“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资本的历史使命”也就终结了。^① 马克思的这两个预见是非常伟大的,不仅被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为人们理解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科学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还为理解阶级概念的变化(比如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及其阶级斗争的变化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阶级、阶级关系的展开形式和运动形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的分析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极为精彩生动和重要的部分,也是被后继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忽视、误解最多的部分,同时还是最需要我们结合实际发挥思维的抽象力、想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力加以丰富发展的部分。考虑到篇幅限制,下面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分析中最为经典的部分做一简要的复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的定义是依据人们与劳动的关系做出的。占有劳动物化形态、利用生产资料雇用工人进行生产劳动并占有剩余价值的那个集团,被定义为资产阶级。反之,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则是指丧失了生产资料被资产阶级所雇佣并为资产阶级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个社会群体。而所谓阶级斗争,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则围绕着剩余价值这个原点展开,相应地在资产阶级内部围绕着如何分割剩余价值展开竞争,工人阶级内部则围绕着争取就业这个中心环节展开竞争。

剩余价值是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的那个价值量,进而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围绕着剩余价值的斗争在本质上表现为是延长工作日还是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工人的要求是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反之,资本方则尽可能延长工时,直到它的自然边界。在长达近 300 年(16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这一斗争或因工人阶级只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追随者,或因成熟程度还没有达到自觉状况而处于不利状态。直到 19 世纪中叶,在英国宪章运动的推动下,英国工人首先迫使英国议会通过立法将工人的日劳动时间限制在 10 小时(1847 年)。同一时期,法国工人的日劳动时间为 12 小时,其他一些国家还有长达 14 小时甚至以上的。19 世纪中叶,西欧、北美工人阶级的普遍觉醒和风起云涌的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工人阶级为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1866 年,美国工人联合会做出决议要求将日劳动时间限定为 8 小时;1868 年,争取 8 小时工作制又成为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口号和工人运动的具体奋斗目标。在宪章运动、1848 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的持续推动下,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行 8 小时日工作制。时至今日,与一个半世纪前相比较,欧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为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更是取得丰硕的成果:不仅周工作时间缩短近一半,而且工资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劳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我们完全可以预测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指日可待(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必要劳动时间很短,自由活动时间很多的社会)。^①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工人阶级实际境况的

^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28—929 页。

好转和受奴役命运的局部解放绝不是资产阶级仁慈恩赐的结果,而是由工人阶级进行切实斗争所争得的结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果的具体体现。当然,工人阶级要取得这些斗争成果是需要现实的客观条件的,而这些客观条件就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和内在矛盾之中。

首先,尽管在社会总产出设定为静止的状态下,劳动与资本的各自所得是直接对冲的,但劳动的生产效率是可变动的,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亦即通过缩短工人生产自身劳动力商品的必要时间,资本仍然可在提高工人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劳动环境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甚至更多的剩余价值。进而,资产阶级在保证自己能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甚至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前提下,在工人阶级的斗争面前退却了。

其次,从劳动产品到商品在市场上的实现这一惊险的一跳是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实现的。追求尽可能多的超额利润是个别资本增殖自身的不二法门,而增加超额利润就必须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进而,资本家阶级的内部竞争客观上为总体缩短工人劳动时间提供了机制上的可能性。

再次,自17世纪以来的近代自然科学的长期积淀从外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前述提到的资本与科学联姻,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以及资本在科学部门的渗透乃至控制,为资本无限地追求相对剩余价值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换言之,科学的发展,科学的生产化,生产的科学化,为资本在与劳动(工人)的斗争面前准备了广阔的退却空间。

第四,随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不断成熟,工人政治民主(以普选制为核心)权利不断提高。^①工人阶级通过已争得的政治权力,从政治上迫使资产阶级在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劳动时期等一系列权力和利益斗争中做出让步。

第五,资本在全球的奔走,19世纪后期开始突然猛增的海外利润,又为资本在本国与劳动(工人)的斗争中的退却进一步扩大了空间。^②在这里,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讲,欧洲工人阶级局部解放程度的提升是搭了资本在海外扩张的便车;或者反过来讲,资本在海外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迫于国内工人阶级日益

^① 19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民主政治,是现代工人阶级斗争的产物。参见胡承槐:《马克思历史总体观视域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浙江学刊》2014年第6期。

^② 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衡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98页。

高涨的权利要求的压力。

第六,工人阶级的自发状态,个别工人在一国范围内、一国工人在世界范围内围绕就业而展开的相互竞争,客观上有利于资本的利益,延缓着工人劳动时间不断缩短的客观趋势。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致力于工人运动的国际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最后,工人阶级的内部竞争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不仅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且这一解放是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这也印证了早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对立的阶级是成对地产生,成对地灭亡的。

(四) 将三条理论脉络统一起来的三个分析工具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按照三条逻辑脉络铺展开来的,然而这三条逻辑脉络并不是平行的互不交集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交叉、互为说明的有机体系,其中“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关系”“历史因素”三个范畴起着最为关键的分析工具的作用。

首先,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范畴构成三条逻辑脉络展开共同的逻辑元点和交汇点。不论是价值运动形态的理论展开,还是生产劳动形态的理论展开以及关于资本(资产阶级)与劳动(工人阶级)对立斗争的分析,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范畴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起着从理论分析逻辑设定转向现实实证分析的转换作用。不论是在价值运动形态的分析中,诚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价值、价格的确定以及利润、平均利润等所有有关价值方面的概念的建立,都是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范畴的基础上构建起来并转化为经济现象的具体分析的,还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形态的分析,比如劳动方式(分工合作、劳动管理等)的改善,机器的采用,工艺技术水平提高,等等,都无不以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为逻辑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起点,是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一范畴所内含的社会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现实条件下的具体展开形式。至于工人阶级围绕缩短工作日而展开一系列斗争的分析更是直接建立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商品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之上,是这种社会关系运动在阶级关系上的人格化表现。

其次,社会关系范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预设的前置的逻

辑前提,而且也是将全部理论中各式范畴、概念串联起来、统一起来的分析工具。在这里,犹如人体中的经络神经和血管,使得整个人体运动起来一样,社会关系范畴使全部经济学范畴概念、理论体系运动起来,并赋予经济行为以社会的、政治的意义,从而保证理论的体系性、完整性和宏大性。

最后,历史因素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概念范畴都以相应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历史事实及其具体进程为依据,体现着逻辑和历史的高度统一性,从而保证了理论(概念、逻辑、体系)的历史确定性、现实性、准确性和理论体系的开放性。比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封建关系解体、独立自由个体的生成为前提,劳动方式的进化要以科学、教育的发展为条件,缩短工作日的斗争需要议会、法律等国家部门的介入,等等。

综合以上全部分析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理论,更不是关于私人赚钱的工具指导学,与其他任何经济学理论相比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理论特色就在于它的“政治性”:抱着为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辩护,为无产阶级求解放指引方向的价值观,用他创立的总体方法论结合历史、社会、法律、政治全景式地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资本的秘密和社会本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和历史宿命,并据此提出指导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原则和策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大体上是由价值学说、生产劳动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组成的有机体系,进而需要我们同时运用“三只眼”即“劳动价值论之眼”“劳动方式进化之眼”和“缩短工作日之眼”去观照、领悟和理解它的博大与精深,并将它运用于改造现实世界,运用于劳动者的解放事业。

三、科学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其宏大的体系、严密的逻辑和对经济(社会)现象背后本质的深刻揭示,自它诞生以来一直发挥着任何其他经济理论无可比拟、无法取代的理论威力和实践功能。它对我们今天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全面的指导意义。下面择其要者叙述一二。

(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何以可能?私有经济、雇佣劳动蓬勃发展与社会主义如何兼容?党和政府宏观上统筹、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合法性何在?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在实践上对上述问题一再给予并将继续给予肯定性的回答,但是由于我们的理论界还没有从理论逻辑上给予完整的推导和说明,对上述问题的疑惑依然普遍地存在于社会各界(在境外也多有表现,如“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共产党专制论”、某些“中国崩溃论”)。然而,只要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则不难对上述疑问给出逻辑清晰的理论说明。

首先,什么是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对资本支配劳动关系的否定和扬弃,有两种方式:一是这一矛盾关系的彻底消除,即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到来,具体表现是自由活动时间的极大化,生产劳动时间的极小化;二是在资本与劳动对立关系仍旧存在的条件下,扬弃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旧形式。扬弃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在总体上仍旧保持资本支配劳动的条件下,劳动地位不断提高、劳动条件不断改善、劳动工资不断增长、劳动时间不断缩短,积小胜到大胜,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形式是工人阶级通过自觉的政治斗争、政治革命,掌握政治领导权,在仍旧存在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实现总体上的劳动对资本的支配或节制。这两种方式、两种形式马克思(包括恩格斯)都是做过探讨分析的。^①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通向共产主义的具体路径不是唯一的,而是开放的、多样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历史阶段的行进路径上看,则显然属于第二种方式的第二种形式。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将贯穿于始终。相比较于资本主义有近500年的历史,社会主义依然属于新生事物。苏联时期企图完全消除商品经济这一历史背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它的失败实属必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前30

^① 胡承槐:《马克思主义历史总体观视度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浙江学刊》2014年第6期。